专题

流金岁月——冯其庸先生在人大国学院

孙家洲

“这个院长，我要么不做，要做就要认真负责地做、有职有权地做。我不是来担任虚名的院长。”冯先生是如此说的，更是如此做的。冯先生提出要聘请有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的退休老先生来国学院授课。这就是国学院五大“特聘教授”的缘起。

2017年1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来电，告知了冯其庸先生于午间逝世的噩耗。我尽管思想上有所准备，但是，依然抑制不住悲从中来！

我有幸认识冯先生，始于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创立国学院。当时，人大学校领导礼聘校友冯其庸先生担任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早年间曾经在人大中文系任教，后来奉调离校，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副院长至退休。冯先生受聘为国学院的首任院长时，已经是他荣退十年之后了。也许，有的人会认为一位早已退出人大人事系统之外、已是81岁的高年长者担任的国学院院长一职，应该是“荣誉性”的职位，冯先生既不会、也不必亲自过问学院的具体工作。但是，上述出于常识性的推测是不对的。冯先生在受命之初，就曾经非常明确地表示：“这个院长，我要么不做，要做就要认真负责地做、有职有权地做。我不是来担任虚名的院长。”冯先生是如此说的，更是如此做的。我当时被人大校领导任命为常务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在冯先生的任期之内，我得以全程追随左右，目睹了冯先生为了国学院的成立与发展所做出的无私奉献、鼎力担当、杰出贡献。时隔十年有余，许多场景依旧历历在目。

礼聘名师、组建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人大成立国学院，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关注。但在成立之初，国学院的在职教师仅仅只有七位，远远不能胜任培养国学人才的要求。冯先生与各界人士多方沟通，人大领导也给予了引进人才的特殊支持，但在短期之内要改变教师队伍人才不足的局面，谈何容易！冯先生为此而多方筹划。

冯先生提出要聘请有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的退休老先生来国学院授课。这就是国学院五大“特聘教授”的缘起。这五位先生是：庞朴、傅璇琮、韩兆琦、王炳华、谢桂华。他们在历史与哲学、古代文学、西域考古学、简牍学的领域内，都有很高的造诣与声誉。冯先生提出的设想是：要请几位老先生真正进入人大，要给学生讲课、指导研究生，起码要给学生搞学术讲座。几位老先生的加盟，确实让学生可以领略名师风采，有效地提升了国学院的教育质量，提升了学术影响力。五位特聘教授之中，除了庞朴先生受聘到他的母校山东大学任教、谢桂华先生因患癌症而不幸逝世之外，其他的三位先生，都在国学院任教多年。其中，傅璇琮先生2006年指导的博士生卢燕新，日后完成的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冯先生提出：要不惜重金聘请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到国学院任教。他对我说过大意如下的话：“以重金聘请人才，是我们表达尊重人才的诚意。人大提供的工资，不足以吸引真正优秀的教授来国学院任教。你们负责用心物色人才，我来设法解决聘任人才的经费来源问题。实在不成，我可以卖字画来筹钱请人。”我当时听了，极为敬佩！在国学院的筹建过程中，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适时给我们推荐了在国外工作16年的沈卫荣教授。冯先生当机立断，对我说：“荣教授是有眼光的人，他推荐的沈卫荣，我们要不计成本聘请过来。”冯其庸先生明确表态：要向人大领导申请给海外归来的沈卫荣解决住房问题，给他的工资按照年薪20万元支付（费用从冯其庸先生从国家高层申请的经费中解决，见下）。在当时，20万年薪在大陆的大学教授里面是相当罕见的。在冯先生的直接运作之下，沈卫荣教授于2006年4月从日本归国，受聘为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沈卫荣教授又推荐了乌云毕力格教授加盟。很有学术特色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国学院建成不到半年就

（下转5版）

（上接3版）

成立《红楼梦》写作组，冯先生被调入。这是冯先生开始研究《红楼梦》的开始。不言而喻，这类写作组要完成的主要是政治性的写作任务，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从此以后，在写作任务之外，冯先生开始认真研究起《红楼梦》的版本、曹雪芹的家世来，即使是政治任务的写作，毕竟也要熟读《红楼梦》。另一方面，应该是考虑到写作组的临时性，1974年前后，冯先生曾经调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写作组去，但当年10月，国务院成立《红楼梦》校订组，由文化小组副组长袁水拍当组长，冯其庸任副组长。校订组是毛主席同意的，而最初的建议就是冯先生提出，报告也是冯先生起草的。于是，红学成为冯先生的主攻方向。

《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瓜饭楼丛稿之冯其庸文集》

《红楼梦》在中国已经热了很多年，尤其是最高领袖重视《红楼梦》，红学于是获得了最社会化的影响。但是，《红楼梦》竟然没有一个校注本，对于红学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基本的遗憾。于是，校订组开始从全国抽调学者参加工作。1976年，校订组已经有了不少成绩，但在这个多事之秋，校订组是否解散曾经是一个问题。当然，最后还是保留下来。到1979年1月，在校订组的基础上，成立艺术研究院所属的红楼梦研究所，5月决定出版专业刊物《红楼梦学刊》。1980年，中国成立红学研究会，吴组缃出任首届会长，冯先生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从《红楼梦》写作组，到《红楼梦》校订组，再到研究所，最后出版学刊，原本一个政治色彩极浓的写作组，完全转轨成为正规的学术组织。冯先生担任研究所的所长和学刊主编（另一主编是王朝闻先生），红学的著名学者都参加了编委会。这个转变对于中国红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冯先生是促成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人物。

1980年7月2日，俞平伯致冯先生的书信中写道：“《红楼》本是难题，我的说法不免错误，批判原可，但不宜将学术与政治混淆。”（“语可诲人，光可鉴物”，见《剪烛集》）俞平伯是红学政治化的受害者，对于红学正在发生的巨变，他的感受可想而知。在所有的学术都饱受政治化影响的时代，似乎只有红学走出了一个相反的方向。说冯先生驾驭了潮流未免太夸大了，但冯先生利用了形势，应该是不错的。这种利用，正是学术化的正途，红学从此避免陷入更深的政治泥潭，踏上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康庄大道。《红楼梦》校订组是一个良好开端，在“文革”结束之后，乘着拨乱反正的东风，红学快速走进新时代。或许，在冯先生的心中，有一个无锡国专时期形成的念头始终没有改变：红学是门学问。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一定要恢复红学的学问本质。就如同国学教育，国学的理念和系统，始终隐藏在冯先生的心中，一旦机会成熟，立刻落地生根。

冯先生以研究红学著称，但在其他的学术领域也多有建树，治学广博令人印象深刻。这一特点，可以在无锡国专的教育中获得部分答案，更可以说，这原本就是国学的特点。近来，常有学术大师缺乏的讨论，那么大师的特征是什么？就学术研究而言，只有治学广博，方能影响更大。看看曾经的中国学术大师，国学基础深厚，差不多是共同特征。王国维如果活在今天，适合文史哲哪个专业？哪个专业都胜任。陈寅恪曾经被中文、历史两个系聘为教授，一时传为佳话。胡适呢？虽然当时有人认为胡适的国学根底不足，但从今天的眼光看，恐怕也是文史哲都有资格做教授。冯先生以及他的先生的那代学者，有学术，能创作，多专多能是很普遍的，所以大师纷出。在探索其中的原因的时候，人们强调中西融合的意义。当时中西融合能够创造大师，今天不是同样存在中西融合吗？如此分析，我们今天缺乏西学吗？今天中西交流的程度降低了吗？今天中西交流的机会变少了吗？显然都不是。比起曾经的学术大师来，我们今天缺少的其实是国学教育，不仅缺少古代经典知识，也缺乏对文化传统的尊重与温情。在满怀中国文化自卑感的人群中，数典忘祖很容易，融合中西太难。

冯先生治学广博，来源于他接受的国学教育。书法家、画家、摄影家、戏剧学家、红学家等等概括冯先生的学术人生的词里，恐怕还是国学家更恰当。作为国学家的冯先生，他的人生是精彩的，对于后学，是富有启发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